

3 三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 史 料

第 一 册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

085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 史料

第一册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俄语编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Типография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Уделов
С.-Петербург 1905 г.

内部发行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

第一册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俄语编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4³/₈ 101千字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417 定价: 0.51元

中译本序言

本书编者尼·伊·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汉学家”，1892—1912年间曾长期任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蒙语文教师。他发表的著作有《冒充商人霍罗谢夫的柳比莫夫1845年塔城、伊宁之行》(1909)、《俄国东方语言官方教学情况》(载《1876年彼得堡第三届国际汉学家会议著作集》第1卷，1879—1800年)等。编入本书作为主干著作的《历史纪事》，它的作者是沙俄派驻北京第八届传道团团长，俄国东正教会的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此人毕业于基辅神学院，曾在帝俄莫斯科大学讲授东正教教义和圣经。索夫罗尼于1794年来华，在北京住了十三年半，因侵华“有功”，回国后受到沙俄当局的奖赏、提拔。索夫罗尼死于1814年。收入本书的另一篇重要作品即《历史纪事补篇》的作者瓦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1837年在喀山大学东方历史语言学系毕业后，于1840年随第十二届驻北京传道团来华学习梵文和汉、满、蒙、藏文。瓦西里耶夫曾将《论语》译成俄文，把尊孔与侵华紧密联系起来，颇受沙俄当局的赏识。归国后历任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的教授，1886年当选沙俄科学院院士。

东正教是沙俄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侵略的加强，东正教的魔爪也伸到了雅克萨等地，在那里出现了第一批东正教堂，它们成为沙俄进行精神侵略的机构，直至沙俄被迫退出黑龙江地区才被彻底扫除。雅克萨战役之后，北京又出现一个东正教堂和一些东正

教徒，这是十七世纪沙俄侵华的产物。北京的第一批东正教徒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投降或投奔清朝的哥萨克，为数大约一百人，即俄国史籍上所谓“阿尔巴津人”。清政府允许他们加入旗籍，把他们安置在北京城的东北角，允许他们信仰自由，并赠给他们一座庙宇。他们就在这个庙宇里设立了东正教堂。此事引起沙俄当局的极端重视。于是彼得一世借口北京东正教堂需要神甫主持，经过和清政府多次交涉终于获得允许后，于1715年派遣第一个俄国传道团来北京。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缔结后，沙俄正式获得在北京设立教堂和派遣教士、“学生”来华传教学习的权利。1728年以后，沙俄每隔十年（后改为五年）改派传道团来北京，接替前届传道团。从17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先后共派遣十二届传道团来北京。每届传道团以修士大司祭一人为团长，一般包括修士司祭二名，修士辅祭一名，加上学习语文的“学生”，共计十名左右。传道团的规模不大，但能量不小。它挂着宗教招牌，到处刺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密情报，直接为沙皇政府效劳。驻北京东正教传道团的无数侵华罪行，是我们研究沙俄侵华史时必须予以认真清算的。

维谢洛夫斯基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这本书所收入的有关东正教的资料比较集中、完整，它们都是历届传道团成员的记事本和作者本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比较有用的有：（1）历届传道团成员包括教士、“学生”、监护官以及其他随同来华的非宗教人员比较完备的名单；（2）历届传道团派遣来华的经过，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包括对教士“学生”违法乱纪、腐朽糜烂生活比较真实的描述；（3）传道团的某些团长、“学生”和沙俄政府的特殊关系，为沙俄政府效劳的经历；（4）沙俄政府对传道团的“工作指示”等。这些对沙俄侵华史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各部分的作者由于教会内部矛盾，虽然也透露出一些东正教内部黑暗情况，但他们往往把东正教会侵略活动的内幕隐藏起来，讳莫如深。例如，1780年沙俄当局给第七届传道团的“工作指示”第九条规定，在华东正教士“应尽量把当地动态认真详细地写成材料上报”沙俄当局。他们是怎样执行这项“指示”的，本书没有任何反映。本书作者站在侵略扩张的立场上，许多问题在他们的笔下是被颠倒、被歪曲的。例如，本书把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入侵叫做“猎人骚扰边境事件”；硬说雅克萨不属中俄任何一方；胡说“中国以武力威胁”沙俄逼签尼布楚条约等等。本书记载第一个俄国传道团到达北京的日期是1716年，但这是错误的，《异域录》（图理琛著）和《1619—1792年俄中外交文献汇编》（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两书都作1715年，应据此校正。另外，本书关于中俄两国围绕雅克萨的斗争和尼布楚谈判经过的叙述，也错误百出，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参考时加以注意。

本书俄文原文比较难读，译校者在译校过程中，曾做细致的加工，付出辛勤的劳动，作为读者，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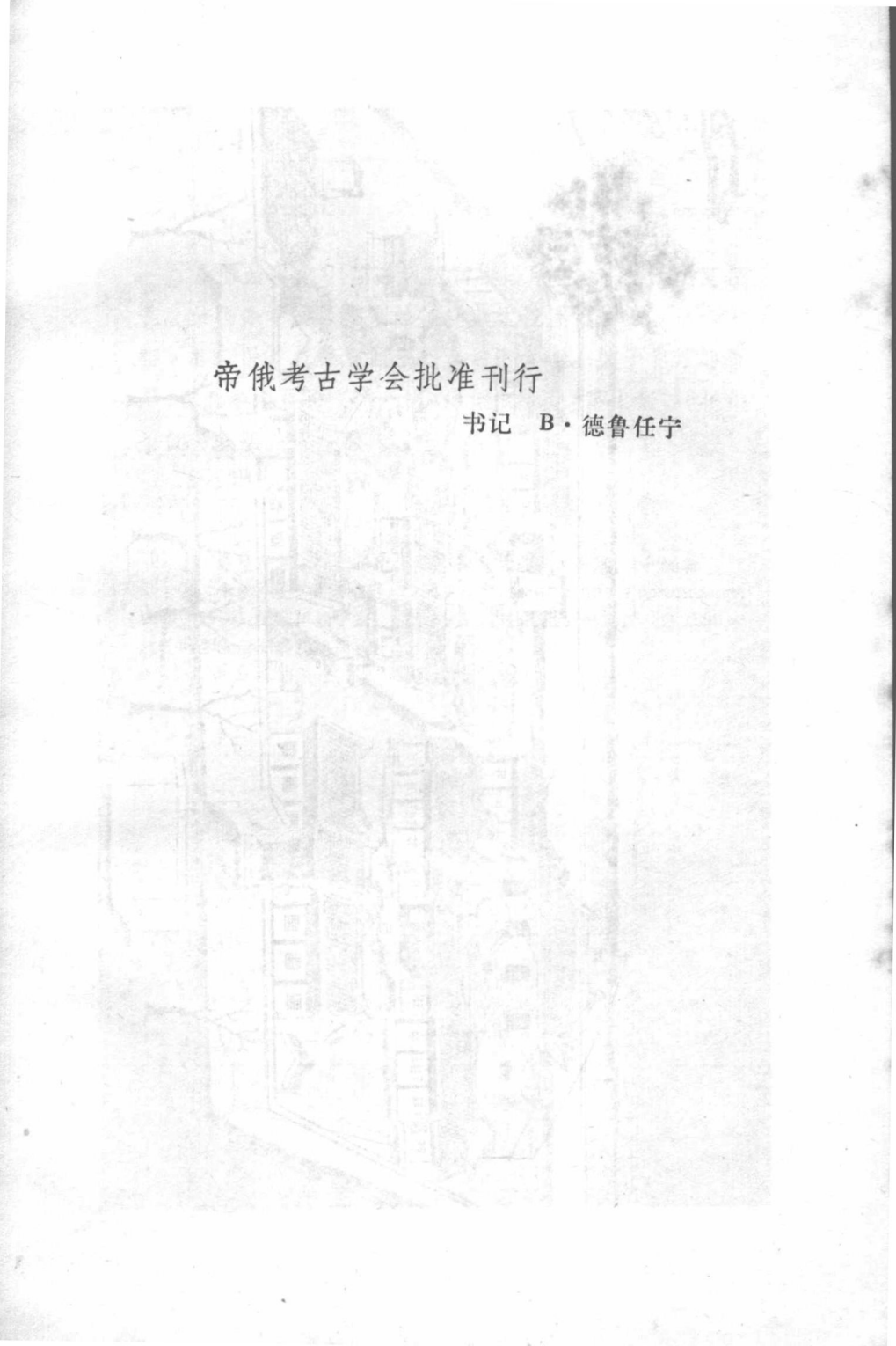
杨诗浩

1978年3月5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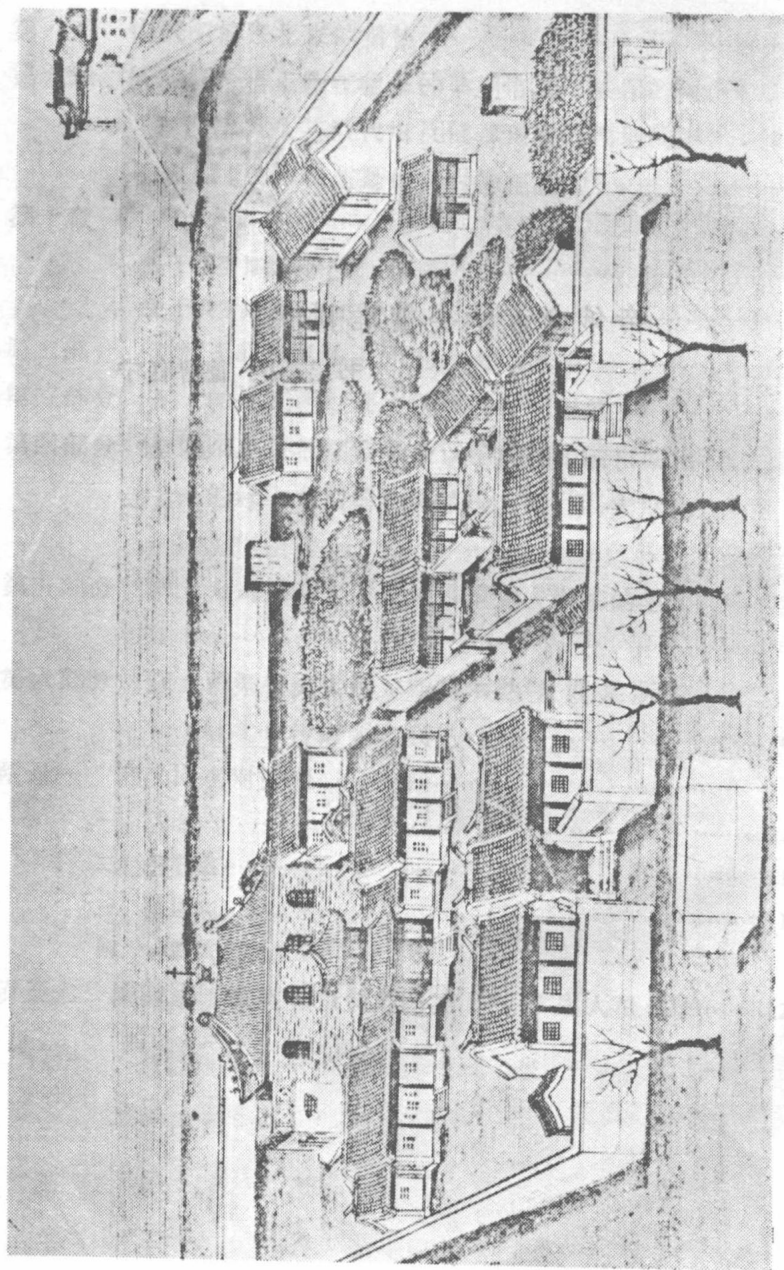
原书编者序	5
第一部分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历史	
纪事	15
前言	15
第一章 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中国定居的问题	17
第二章 关于划分边界的简单情况	24
第三章(一) 关于阿尔巴津人被带至北京后的情况	26
第三章(二) 关于俄罗斯佐领	31
第四章 向北京派遣俄国传道团的原因	32
第五章	35
1. 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及条约缔结前 俄国宗教人员在北京的给养情况	35
2. 关于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39
3. 关于俄馆中的奉献节教堂	42
4. 关于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	43
5. 关于传道团团长拉夫连季	46
6. 关于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	47
7. 关于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	51
8. 关于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	54
9. 关于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	55
10. 关于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56
第六章 关于派往北京归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宗教人员的 简况及教堂辅助人员的人数	60
第七章 关于历届派往北京由修士大司祭管辖的学生人 数	66

第八章	由俄国前来北京的信使	69
第九章	俄罗斯希腊正教在北京的早期情况 被俘的阿 尔巴津人及其后代以及信奉正教的当地的 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对待正教的	70
第十章		75
	1. 关于俄罗斯馆的仆役	75
	2. 关于俄罗斯馆的专门记述	77
第二部分	对派至北京的传道团的补充记述	79
第三部分	瓦·帕·瓦西里耶夫所作的补充记述	82
第四部分	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前往中国京城北 京的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 的工作指示	89
第五部分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呈文 节录	96
第六部分	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所著 《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节录	102
附录一	俄汉译名对照表	111
	一、人名	111
	二、书刊名	118
	三、修道院、教堂名	119
	四、神职人员职称	120
附录二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第1—15届人员名单	122



帝俄考古学会批准刊行

书记 B·德鲁任宁



左图为北馆^①，原为我国传道团所在地，现已不复存在。该图系中国画家所绘，现藏于亚洲博物馆。承卡·格·扎列曼^②盛情将此图提供编者复制。关于北馆的布局，请看季姆科夫斯基所著《中国旅行记》第1册，1824年圣彼得堡版。——原编者

① 原址在北京城东北角，今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译者

② 卡尔·格尔曼诺维奇·扎列曼(Залеман, Карл Германович, 1849—1916)，俄国伊朗学家，科学院院士，彼得堡大学教授。自1890年起任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译者

原书编者序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这个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原因而产生的独特机构，曾经为俄国政府在与中国交往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们在研究中国人民及其语言文学方面之所以能取得现有的成就，也与它有很大关系。因此，任何一份尚未发表的、但有助于弄清该传道团历史的资料，无论就了解历史而言，或者就了解风土人情而言，都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兴趣。

第八届驻北京传道团(1794—1808年)团长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希腊正教的情况报导》一书，就是这样一种史料。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这部著作早就为《西伯利亚通报》的出版者斯帕斯基所知悉。他在《俄中贸易和国事交往的早期情况及俄国教堂和传道团在北京的设立》一文中，就曾引用过这部著作^①，并指出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还搜集了一些有关我国各届驻北京传道团的资料^②。契尔尼哥夫教区至圣的菲拉列特·古米列夫斯基在其所著《俄国宗教文献一览》^③一书中曾经指出，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记述了俄国各届驻华传道团的情况(系手稿)”。

后来有一段时间，这部手稿下落不明，其原因读了下文即可明了。修士大司祭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为了撰写驻北京传道团的历

① 《西伯利亚通报》，1822年，第5册，第143页。

② 同上，第7册，第190页。

③ 见该书，第3版，1884年圣彼得堡版，第2册，第414页。

史概况^①曾经找过这部手稿,但遍寻无着,以致对是否有这部手稿产生了怀疑。这一点从下文中就可以看出来:

- 2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其所著《雅金夫·比丘林神父》一文中曾经指出,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记述驻北京各届传道团的著作(手稿)在北京传道团中并无人知晓,因此他怀疑人们是否把这部著作与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混为一谈了,或者这部著作与也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是否就是一回事,或者就是1810年出版的《俄国圣秩制度史》第2卷中所载的那份北京修道院历届修士大司祭的名单和那一封公文^②?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同一篇文章中认为,可能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提供了有关驻北京传道团的史料,这些史料由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编入1810年出版的《俄国圣秩制度史》第2卷。因此,他(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其所著《雅金夫·比丘林神父》这篇历史研究性文章中说:“契尔尼哥夫教区至圣的菲拉列特在其所著《俄国宗教文献一览》中有可能把大概是索夫罗尼所编的有关以往各届传道团的资料理解成为索夫罗尼的著作了。倘若如此,则这部著作就已印刷出版,而不再是手稿了。”^③

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在其所著《关于耶稣会教士的详细资料》一文(系以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著作为兰本)的序言中曾经宣称,他还著有《阿尔巴津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向北京派遣

① 《东正教驻华传道团二百年》,载《正教之友》,1887年2月号,第252—266页;3月号,第317—351页;4月号,第460—507页;5月号,第99—136页;6月号,第167—190页;7月号,第310—340号;8月号,第402—455页;9月号,第30—58页;10月号,第188—213页;11月号,第287—343页。又见《东正教驻华传道团二百年》,单行本(两卷集),1887年喀山版,第5—367页。单行本没有收入《正教之友》1888年1月号第148—156页所载的有关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历史的文献目录。这本学术著作只写到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那届传道团为止。

② 《正教之友》,1886年2月号,第168页。

③ 同上,第179页。

传道团的缘由》一书。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在其上述关于东正教驻华传道团的学术著作中,虽然也引用了索夫罗尼所说的这些话,但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在外交部档案馆中没有发现这本书。根据以上所述的情况推论^①,可以认为,这本书无非也是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的著作的抄本而已”^②。

现在对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著作的一切怀疑和猜测都应该消释了。

帝俄考古学会名誉会员、名著《佛教》一书的作者至圣的尼尔·伊萨科维奇曾于1838—1854年主持伊尔库次克教区。他在伊尔库次克发现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献。后来尼尔大主教调往雅罗斯拉夫尔城,他把关于俄国驻北京传道团的一部文集手稿赠给了考古³学会,并附有1858年5月16日第927号公函一件。在文集的扉页上有尼尔大主教的亲笔题词:“有关中国及俄国驻北京传道团的历史纪事。大主教尼尔,1852年,伊尔库次克。”根据这项题词可以推断,尼尔大主教曾经打算发表文集中的材料,但不知为何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在雅罗斯拉夫尔,尼尔大主教在《雅罗斯拉夫教区公报》1861年第50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与主教英诺森·库利奇茨基的关系的短文,就是利用了在这部文集中发现的材料写成的。

这部文集装订成一册,大小与普通书写纸一样,封皮是红色精制羊皮,封面上印有金色的基督受难处各各他^③的十字架。考古学会收到这份赠品,当即交给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④

① 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想说的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利用了载于1822年《西伯利亚通报》上的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一文。

② 《正教之友》,1887年11月号,第329页。

③ 各各他:耶路撒冷城外小山名。——译者

④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俄国汉学家,1840年随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所率领的那届传道团到北京学习满汉语文,从1855年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866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译者

审阅，他又特别增补了关于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驻北京传道团的资料，对这部文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正如一些学者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忘了把这部文集还给考古学会。文集到哪里去了，学会也无案可查。这部文集就是这样失踪了四十多年。瓦西里·帕夫洛维奇死后，他的继承人整理文件时发现了这部文集，才把它交还给主管部门。

这份手稿的第一部分系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希腊正教的情况报导》及他本人所作的注释(手稿第1—88页)。这正是最近认为并不存在或已遗失的那部著作。索夫罗尼的这部著作写在兰色厚纸上，系出自文书的手笔，其上有不同的笔迹作的修改和增补。不知是谁还把记述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的第九届传道团和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的第十届传道团的资料作为附录列入了这部文集(手稿第88—91页)。

此外，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又增补了关于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的第十一届、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的第十二届和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的第十三届传道团的资料。关于修士大司祭古里的第十四届传道团，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只是提了一下。由于当时已决定再由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率一新传道团前去替换第十四届传道团，且帕拉季·卡法罗夫于1864年9月16日已由彼得堡出发，而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并未提及此事，可见他的增补是在这一年以前作的。

其次，文集中还载有：

1. 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1780年给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手稿第93—100页)。
- 4 2. 满清中国的省份、司法衙门、官吏、国家收入等一览表及其

数目^①(手稿第 101—107 页)。

3. 嘉庆帝关于查办大学士和中堂^②的谕旨(译自满文^③,手稿第 110—114 页)。

4. 至圣的托波尔斯克大主教伊格纳季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信(抄件)^④(手稿第 117—121 页)。

5. 一篇报导,内容为:(一)俄国人是怎样开始在中国居留的,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外国人难以接近的国度以及他们是怎样来的?(二)从何时开始派遣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人员的,派遣的原因是什么?

这份报导写在普通大小的灰色书写纸上,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关于驻北京传道团的第一篇文章的另一抄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拼写法与第一个抄本略有不同,文句也略有增补。所有重大改动之处都加了注解,并注明系第二个抄本所改。看来,这第二个抄本得以保存下来,要归功于尼尔大主教,页边上的某些批注可能也是他加的。

6. 一篇没有署名的呈文节录,内容写的是驻北京的修士大司祭在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困难^⑤。

① 文集中没有这个标题。那里写的是《中国简介》。这里所用的标题是引自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标为己著的《纪事》(《正教之友》,1887 年 11 月号,第 330 页)。这份资料现已无甚价值,故未收入本书。

② 指和坤。——译者

③ 这道谕旨系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以个人名义提供的。叶·费·季姆科夫斯基在其所著《中国旅行记》第 2 册第 133—140 页予以发表,并说明译文系出自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之手。

④ 这封信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在北京发现并交给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正教之友》,1887 年 11 月号,第 342 页)。该信由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收入《俄国圣秩制度史》,181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495—500 页。《伊尔库次克教区公报》1864 年第 10 期又根据该书予以转载。因此,尽管该信的抄本对已发表的版本作了某些修改,但本书亦未收入。

⑤ 这份呈文节录无疑是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写的。可参阅《正教之友》,1887 年 11 月号,第 308、322 页。